

# 市场经济下的仲裁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邱冬梅

谈

到市场经济,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词语中隐含的诸如效益、效率、自由一类的形容词。对仲裁而言,这些并非新鲜的价值理念。在论述仲裁制度的基本特征时,高效、低成本、意识自主性强、灵活性大和保密性好几乎成为人们对于仲裁方式优越性之所在的普遍评价,这也是仲裁区别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得以在市场经济愈演愈烈的今天得以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更深刻地理解仲裁制度的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即仲裁作为解决私权利纠纷制度的始端。在古罗马商业发展时期,人们开始使用仲裁方法解决贸易往来中的争议,当事人双方请出一位有威望的人作为居中人以平息纷争,鉴于当事人对于仲裁人的信任,双方往往会自觉地服从最终的决定。<sup>[1]</sup>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并注意到这样一些细节:首先,双方选择的裁判官是一位具有威信的人,这样的人被推定是是权威和资历的智者,他的声望和资历使判断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权威性,隐含着要求被裁判者遵从与顺服的意味。其次,当事人的自律性和配合意识在期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仲裁仍然流于纯粹的自发性的民间争端解决方式时,裁决的执行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再次,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仍然囿于较为有限的空间,用今天我们熟悉的语词即“熟人环境”、“乡土社会”。当人们放弃对簿公堂、公然对立的诉讼途径而选择一位意定的仲裁员以趋于平缓的方式协调争议时,事实上就已包含着一种追求平息纷争、和平相处的心态在其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仲裁这个词语早期的含义中得到印证。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仲裁一语最初的含义是指在纠纷发生以后,双方达成一致,将矛盾提交第三人以友善地解决问题的途径。<sup>[2]</sup>一直到中世纪,仲裁被吸纳为一种法律制度后,在被商人们频繁地运用于贸易纠纷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样的理念一直得到沿袭。为了使双方的敌对局面尽可能缓解,对立情绪得以控制于最小的范围内,当事人双方选择了一位共同信任和尊敬的人进行裁断,基于之前的同意,双方谨守尊重裁决的诺言,自觉执行裁决结果。<sup>[3]</sup>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权威的仲裁者、较强的自治意识和当事人友善寻求解决的诚意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早期仲裁精神的与众不同。

然而事过境迁,今天我们在与往昔的对比中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营造出的陌生人社会里,人的权威正在无可避免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把既定的规则等可见之物的担保视为建立确信的基石。与此同时,对大量专业化规则的需求引入并发展了一批新兴人群,他们借助着职业化的训练和丰富的技能逐渐地成为影响仲裁发展的中坚力量。虽与案件本身并无利害关系,但是他们的言论却左右着仲裁理念的定位,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引导着案件进程的缓急,他们的品格直接关系到个案解决的效果。这群人中包括律师、仲裁员、仲裁庭工作人员、法官和法学家等。通过不完善的“卡特尔”模式编织着错综复杂的网络,用程式化的法律逻辑、繁琐的程序设计、深奥晦涩的专业术语建构法律职业性组织,<sup>[4]</sup>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着仲裁含义与规则的模板,使得今天看到的制度已与其诞生时纯粹由当事方自发构建的模式和本意大相径庭。我们看到今天的商人从打意要适用仲裁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依赖于专业人士的帮助。仲裁文书的格式要求、可仲裁性的考虑、仲裁规则的约定、仲裁地的选择等专业知识的需求已在实质上束缚了他们意定范围内的自由权。与此同时,法学专家大量地涉入制度的设计和构想,常常习惯性地应用那一套法律严密的逻辑推理,追求程序设计中滴水不漏的效果和法律价值上公正目的的实现。表面上这是知识被精细地分类后不同专业之间的配合共济和各司其职,但往深层里想,却无法回避一层微妙的由利益的分歧和视角的偏差引发的罅隙。为此,我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当事人利益的需求和法律职业者视角定位之间的落差会给仲裁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偏重的是哪一方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法律人如何为经济人量体裁衣,并恰如其分?

## 一、追求价值中的分歧

人们在今天逐渐地接受了休谟的著名论断,即法治是以悲观人性论为基础的,这一特点被归因于“幽暗意识”。具体而言是指“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和遗憾。”<sup>[5]</sup>为此,法治成为不同社会中的人们虽

[1]陈桂明:《仲裁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Robert Hunter, "Anticipating Trends in Dispute Resolution", in Martin Odams de Zylva and Reziya Harrison (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Jordan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p. 9-10.

[3]Mustill, MJ, "Comments on Fast-Track Arbitration", 1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o. 4 (1993), p. 124.

[4]关于“卡特尔”的论述,参阅[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5]张保:《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刘军宁主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0页。



不无犹豫却又无法回避的制度选择,人们不得不试图通过不辞辛劳的制度规划为人性的缺陷做弥补的工作,并从此陷入了一场难以脱身的规则大战中。在争端解决机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的是程序上越来越繁琐的设置。当程序正义的理念首先在诉讼中被建立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sup>[6]</sup>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同样的思维和价值判断应用到了仲裁的领域中。现在看到的是一套几乎与诉讼模式同出一辙的仲裁规则。从仲裁协议形式上的要求到可仲裁性范围的严格定义,从仲裁管辖权的界定到仲裁庭组成的规范,从设定仲裁员行为甚至思想的具体标准到双方举证中采用证据的条件设立,从法律适用的规则建立到配套执行的规定和监督补救措施,法律人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做到把游戏规则设计得面面俱到。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许忽略了游戏主体的另一番别样的感受。试想一位100年前的商人亲眼目睹今天的仲裁,是否会为规则冗长的篇幅和枷锁的繁重而大为惊叹呢?<sup>[7]</sup>

显然,过分强调规则作用的人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即现实中的商业关系并非简单地依赖于观念中的逻辑推理,事实关系的调理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介入;对于理性的经济人而言,行为的目标不是,起码不仅仅是在程序正义中看到法律的尊严,他们想得到的只是,或者主要是借助正当程序为手段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商人固然也会有追求权利的意识,但是他们大多只愿意在自愿交易费用很低的时候创建这种权利,而非一味追求费用高不可攀、毫无效率的绝对权利;<sup>[8]</sup>契约关系虽然落实于一纸合同,但合同本身却不是建立商业基础的足够和充分的条件,在可见的文字和条款背后往往留有另一层无形的关系网,以普遍主义的事功原理为媒介,体现分工体系下角色的相互依赖,强调授权程序和当事人的自治。<sup>[9]</sup>这一点是法律规则和逻辑思辨本身难以体验和涉及的部分。

由此,我们看到了由于价值定位的差异而引发的分道扬镳:一方面,市场经济继续引导着人们向高效率、低成本、灵活运作、财富最大化的方向看齐,商人们日益注意到了长期发展的眼光、合作协调的配合能力、灵活操作中的调整战略对于创造财富的重要价值。他们依旧眷恋高效、低成本、灵活、享有充分自由、享受私人空间等这些早期仲裁特有的品质。而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迷信规则万能,并且过于专注框架设计和逻辑推理的做法却将实务操作中

原本充满灵动和人性化色彩的成分一点点地剥离和挤兑。经验主义、逻辑推理和实践反馈都可以证明一点:过多的规则正在给仲裁制度带来负面的效应——糟糕的拖沓和低效、<sup>[10]</sup>令人沮丧的死板和僵化、当事人自由权限的缩减和消费成本的急剧上升。而且如同运动场的比赛规则一样,仲裁规则常常有意无意地刺激着当事人在两造对峙、双方博弈过程中的强烈竞争心态,彼此之间少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和平心态与和棋双赢的宽容气度,各自追求的是占取尽可能甚至全部的利益份额。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仲裁中频频出现的制造伪证、利用程序相互刁难、故意拖延等现象。英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 Mustill 先生曾经这样幽默地发出警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断,它的大块头是致命的原因之一。很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仲裁制度正在步其后尘。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当学习谦卑的功课,谨慎对待法律制度的每一笔规划。<sup>[11]</sup>

## 二、寻求利益和规则之间的和谐与发展

公元3世纪时,著名的罗马法学家尤里乌斯·保罗曾经颇具先见性地提醒我们:立法,即以审慎刻意的方式制定法律是人类所有发明中充满了最严重后果的发明之一。<sup>[12]</sup>论者的描述中流露出的是对于一种危险的忧虑,即这些“审慎刻意的产物”背离了法律原本应有的样式,与那些紧贴着生活的原貌铺展开的、同人们的客观需要和行为习惯相一致并得到公认和接受的规则背道而驰。1600多年后,事实证明今天的法律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与先知预言的被应验有关。如今的法律参与者们正深陷于“人类制度设计的理论洪流”中,难以自拔。

为此,哈耶克提醒我们应当注意那些在人们的行动中流淌并贯穿着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实际上,在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很容易地发现这样的事实,即仲裁在产生和早期的发展步履正是遵循着这种秩序的引领:是实践而非规则造就和催发了仲裁的生成,是社会现实内在的需要而非某种主观臆造塑造了它的模型,是仲裁的参与者而非理论评论家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着推动更新和改进制度的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肯定地说,尽管现代的“人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这些内在秩序对于仲裁发展导向性的作用却未曾消失过。拨开外层规则的编织网和瓦砾堆,在寻找隐藏于其间的调理着仲裁制度内在生命的潜

[6]关于诉讼中“程序正义”理念的建立和发展,请参阅[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和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7]打量30年前的仲裁制度,人们会发现它远比今天轻便和简易得多。具体描述请参阅:Mustill, MJ, “Comments on Fast-Track Arbitration”, 1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o. 4 (1993), p. 124.

[8]关于“绝对权利”在法律经济学理论中的表述,请参阅[美]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9][英]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0]Andrew I. Okekeifer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 the Most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 Still a Fact or Now a My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98), p. 84-85.

[11]Michael John Mustill, “Arbitration: History and Backgrou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89), p. 56.

[12]Bernhard Rehfeld, Die Wurzeln des Rechts, (Berlin, 1951), p. 67. “人们认为,法律是不能制定的,而法律只能作为某种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来加以适用。根据这种观念,立法作为一种发明,就可能产生某种严重的后果,与火的发明或者火药的发明所具有的那种后果一样。这是因为,越是加强立法,人类的命运就会越依赖于法律。”转引于[英]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流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其中有一条干流正在渗入仲裁规则改革的理念和定位中,并且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仲裁在处理纠纷中扮演的角色。这一秩序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法律社会学家所认同,并被称为是“唯一一种日渐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领域的全涉性秩序”,即市场秩序。<sup>[13]</sup>

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为法律与市场秩序间建立和谐与平衡关系的途径和模式提出构想,在他们的结论中有着惊人的殊途同归的相似点。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个人能够在自愿的交换中沿偏好指向实现最大化,因此,法律应当便利或者促进私人之间的交换协议,消除贸易壁垒和其他不利于私人交易的因素。<sup>[14]</sup> 科斯准则提醒我们:有关的当事人会自动选择对各方都有利的交易方式,因此“一旦建立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只要有迹象表明有益于问题的解决,谈判就能改变法律规则程序”。<sup>[15]</sup> 波斯纳在他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当一项分配的效果是随机的,且追求的效率中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道德力量,那么,同意就可以为财富最大化的社会制度提供一个伦理的正当化。<sup>[16]</sup> 布坎南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每个人的偏好和效用都无法由别人来判断,因此由任何与当事人无关的人或者机构来判断他们应得的部分都是不恰当的。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所有的交易者都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并且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选择达到了一致,这种交易才是有效率的。同理,只有当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规则建立于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那么规则本身才是有效率的。

由此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和启发:法律变迁的动力是来自于法律过程中各个参与者交互意志和协调行动的作用,其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不应视为是“给定的”。事实上每一方都处于一种“策略位置”,其行为取决于其他各方的行为或者对其他各方将会采取的行动的推测。可以说法律是一项整体参与的事业。在法律这场由多方参加的动态进化博弈中,最终结果必定是一种合作。<sup>[17]</sup> 因此,当逻辑推理和理论假设把我们拖带到过分强调以规则和命令为中心的境地时,审时度势和协作意识成为必需的品质。

### 三、市场秩序中仲裁的发展趋势

#### (一) 程序和规则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单一化的经济,而是一种由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的经济构织而成的网络。在这种经济秩序中各种活动并不受到某种单一化的目的序列的支配,它为之服务的乃是所有分立的个人所具有的各种分立且彼此不可通约的目的。<sup>[18]</sup>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每一个当事人都拥有精通的法律知识,在驾驭法律规则上游游刃有余,对于专业用语和文字的甄别和选择有精深的造诣,对问题重点的把握精准而全面,对信息的掌握和应用达到充

分的程度,那么今天我们将看到的是由当事人为自己量身设计的截然不同、风格迥异,并且充满个性化色彩的程序和规则外套。然而事实上,在法律的需求方面,当事人通常不可能且越来越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其导致的结果是设计规则和引导程序的工作无以避免地移交给了法律职业者。这使得在仲裁领域,一种类似于市场服务领域中供求关系的模式正在形成:当事人扮演着需方的角色,在决定使用和启动程序的问题上拥有充分的意识自主权;由于对信息和专业技术依赖性的日益强化,仲裁庭、仲裁员扮演着供方的角色,承担着提供规则范本和引导程序进行的角色;双方在“交易”互动中,追求供求关系的彼此契合和满足程度的最大化;同时,市场固有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带领着仲裁机构之间悄然兴起同业竞争的意识 and 风气。正如经济规律推动着 IT 产业学会对市场做出迅捷而准确的反应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仲裁关系的供需双方在寻求契合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多元化客户和差异性的个体需求势必进一步激发着仲裁规则和程序朝着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秩序的指引下,不同的偏好与需求才可能得到满足和尊重的最大可能性。

目前这一趋势在实践中已初现端倪:一些在国际和国内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仲裁庭已注意到根据案情难易程度和标的大小设计不同程序和规则的价值,并付诸实践。例如增设快速仲裁程序(Fast-track Arbitration)、友谊仲裁制度(Amiable Compositeur)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除了一般的商业性纠纷,人们开始关注为消费领域、建筑业、投资业、船运业、保险及运输领域等设计专门的程序和规则,以弥补诉讼救济可能存在的忽视和不足。<sup>[19]</sup> 有些仲裁庭致力于发展并完善书面仲裁,有些根据文化背景的特点将调解和仲裁巧妙地结合运用,这些应时而生的发明和创新均取得了卓然显著的成效。仲裁实务操作者曾经这样评论到:仲裁的灵活性是其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要旨,也是其在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中颇得人心的重要原因。<sup>[20]</sup>

#### (二) 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地的扩与限

霍布豪斯在他的《社会进化与政治理论》一书中这样说到:“自由的价值在于增进人类思想的活力,而国家控制的价值在于保障外部的环境,从而保障思想的活力。在前一领域里,强制失败了。在后一领域里,则自由失败了……在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下述趋势:如果一项对人类有价值的事务必须取决于自发冲动、思想的自由交流以及自愿合作,那么在这些领域,限制正在逐渐地消除。与此相伴的是另一种趋势,当自由的行为将直接或者间接地伤害同伴,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集体责任感,国家行动范围也在扩大。因

[13] 同上注,第 179 页。

[14] 郑戈:“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北京大学法学院编:《价值共识与法律合意》,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8 页。

[15] [美]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都、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73 页。

[16] 同注[12],第 100-105 页。

[17] Jack Hirshleifer, “Evolutionary Models in Economics and Law” and comments,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in Vol. 4, p. 1-218.

[18] [英] 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2、3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191 页。

[19] Stephen K. Huber and E. Wendy Trachte—Huber, “International ADR in the 1990's: the Top Ten Developments”, 1 Hous. Bus. & Tax L. J. 184, p. 277.

[20] M. Scott Donahey, “The Independence and Neutrality of Arbitrators”, 9 Journal of Int'l Arb 31 (1992), p. 42.



此我们始终在寻找的是自由和限制和谐发展的状态”。<sup>[21]</sup>这样的描述有益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仲裁发展的思路。仲裁制度一路走来先后经历了钟摆的两端：先是定位于保障个体不受公权力控制和当事人绝对自由的民间策略，随后在中世纪发展成为被国家权力牢牢辖制以至于当事人自由意志在其间奄奄一息的法律制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意识到公权力的紧箍咒被错套在本应依赖于当事人“自发冲动、思想的自由交流以及自愿合作”的领地上，强制面临失败时，当事人意思自治才稍稍得以松绑，取得相对的限制性自由。而这种限制，如霍布豪斯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旨于为自由的进一步延伸提供保障。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仲裁中私权利本位的思想正在复兴；宪政上对于权利的认同激励着人们对于自主意识更加强烈的渴慕；法经济学上对于效率与自由关系的论证鼓励着当事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市场秩序中自由的欲望刚刚从狭小的瓶颈中出来，正在寻找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一切带动着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的扩大。目前，这一趋势在各国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的相关仲裁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均可见一斑。以《1999年瑞典仲裁法》为例，这部法律为当事人意思自治铺设了极为宽广的空间。在适用范围上，新仲裁法可适用的纠纷类型为“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事项”，并且它突破性地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导致的民商事赔偿纠纷也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当事人选择可仲裁事项的领地进一步拓宽；在仲裁员的问题上，当事人有决定人数和指定方式的自由，并且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一方可以请求地方法院指定仲裁员。当出现仲裁员拖延程序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撤换并另行指定仲裁员或者由仲裁机构最终处置；对于仲裁形式，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主要是力求保障仲裁运作的灵活性。在其背后透视出的理念依据是仲裁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双方的合意和共识，法律寻找的正是这种真义，而非外在的形式。为了拘守形式上的应和而放弃对真义的探求实为买椟还珠；在程序的问题上，新仲裁法设置了一套非强制性的框架，仅供当事人在必要和方便时作为参照的范本。也就是说，只要双方愿意，他们可以拒绝新仲裁法提供的整套程序而自行设计。<sup>[22]</sup>当事人拥有决定仲裁地点、影响举证方式、约定临时保全措施实施办法和要求证人或专家作证前宣誓等多方面的权利；<sup>[23]</sup>对于裁决，当事人有权决定结果形成的办法以及裁决书签署的方式，并且还可以要求仲裁庭对裁决书作出更正或者解释。在作出裁决决定之前，当事人拥有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法定权利；<sup>[24]</sup>在仲裁费用方面，法律规定任何关于仲裁员补偿费的协议未经全部当事人一致同意均为无效。当事人还可以就裁决中补偿费的问题向地方法院提起抗辩。<sup>[25]</sup>

与这些自由权利同步增长的是那些为了保障自由良好运作而产

生的限制性规则。当自由行得过远，以至于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消耗、时间浪费或者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时，仲裁庭或者法院拥有调整和校正方向的权力。例如在仲裁明显属于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驳回当事人关于指定仲裁员的请求；当事人在将指定的仲裁员名单通知对方当事人后，不得单方面更换指定的仲裁员；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况下，不得妨碍仲裁程序继续进行。<sup>[26]</sup>

### （三）仲裁庭权力的扩与限

如上所述，个人权利下的自由权限不断扩大带来的结果是另一种控制的权力也在谨慎地进行着延伸的工作，这种控制权赋予了行动者干预自由的权力，以实现全局的和谐与平衡。这一权力工具在仲裁被吸纳为国家法律制度后，一直维持着由仲裁庭和法院共享的状态，在不同的时期，两者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联。近几年，法院案件积压、不堪重负的事实，仲裁制度不断完善的主流趋势和排除公权力介入自治领域的意识的强化，使得法院正逐步淡出仲裁的舞台，转而扮演起辅助执行和协调监督的被动角色。在控制权总体上相对延伸及法院权力部分腾出的背景下，仲裁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权力领地。

这一变化在1999年制定的《英国仲裁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参照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和《示范法》等国际公约以及《法国民法典》等国内法的基础之上，新仲裁法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它废除了过去仲裁庭不能自裁管辖权的束缚，规定其拥有决定仲裁协议合法性、仲裁庭组成正当性和可仲裁事项范围的权力；在仲裁程序上，仲裁庭可以灵活地根据案件的特殊需要选择合适的程序规则，以避免不必要的耽延和成本浪费，例如仲裁庭可以自由裁定当事人双方是否有必要交换书面诉状和答辩状；在发现事实和收集证据的阶段，仲裁庭有权将双方的举证行为引向且限于与案件焦点相关的事项上，并决定是否遵守相关的证据规定以及证据的提交形式和时间；在扮演的角色上，仲裁庭正从过去对抗式的惯常模式中走出来，转而采用更为主动和积极的询问介入式的姿态；对于仲裁的费用，仲裁庭也享有控制权，例如可以指定在某一个程序阶段要求对方赔偿相关费用的最高额度。

在规定仲裁庭权力不断延伸的同时，国际与国内立法也注意到了对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进行限制。目前对于仲裁员公正性、独立性的行为标准与专业水平要求的门槛正在逐步提升；当出现仲裁员有意拖延程序或违反正当程序基本原则的情况，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撤消并另行指定；当仲裁员无故违反当事人的合意或者超出授权范围，裁决将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随着专家责任理论的不完善和发展，有些仲裁庭还规定了仲裁员在“违背良心、故意为非”等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sup>[27]</sup>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21]Hobhouse,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s Theory, p. 199. 转引自[美]卡多佐著：《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22]李健男：“论瑞典的新仲裁机制——兼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法学评论》第4期，2002年，第121页。

[23]《1999年瑞典仲裁法》第19条至第26条的规定。

[24]同上注，第28条至第32条。

[25]同上注，第39条至第42条。

[26]同上注，第14条、第18条及第24条。

[27]《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第34条、《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35条和《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31条。